

大连文化局 北京电影学院

忆

田

风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4 北京

(京)新登字 076 号

《忆田风》纪念文集编委会

主任 陈荒煤

副主任 刘国典 冯 韬 雷 加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汪惟 王伟国 田成仁 傅忠海 丛国滋

刘相如 李振远 李前安 李前宽 汪岁寒

杜 宣 郭宝昌 郑洞天 赵郁秀 梁 栋

段吉顺 凌子风 黄 中 黄蜀芹 黎 军

董志华 谢 添 谢铁骊 司徒兆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忆田风 / 北京电影学院, 大连市文化局编。—北京：中
国电影出版社，1994

ISBN 7-106-01012-X

I . 忆… II . ①北… ②大… III . 田风—纪念文集 IV . K

8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4874 号

目 录

序 陈荒煤 (1)

我的自传 田 风 (1)

田风略传 汪 惟 (12)

一 日本留学时期

悼念田风先生 北冈文雄 (20)

我和田风 雷 加 (24)

“中国留日剧人协会”和田风 韦 布 (32)

战斗年华见真情

——忆田风同志在日本东京 颜一烟 (36)

我和田风在日本东京的关系 王式廓 (40)

忆田风同志 吴 咸 (44)

二 晋察冀火线剧社时期

烈火见真金

——忆田风在晋察冀火线剧社 黄 中 (48)

魂系燕赵大地

——忆火线剧社导演田风同志 周 克 (54)

三 丹东《白山》杂志和白山艺术学校时期

虽短暂，却永久 刘相如 (59)

追思与怀念	田成仁	(64)
忆田风同志	王金山 石 岩	(71)
亭亭山上松		
——忆念田风师长	赵郁秀	(75)
牢记田风老师的教诲	王 为	(88)
缅怀田风老师	梁 栋	(97)
相聚的印象	杨明全	(104)
不能忘却的良师益友		
——怀念田风同志	大 波	(110)
怀念慈父般的老领导——田风同志	于 萍	(113)
忆田风同志	鲁 瑕	(116)
难忘的深情		
——忆田风同志	麻 光	(121)

四 旅大时期

永怀田风同志	傅忠海	(125)
大连解放初期革命文艺活动中的田风同志		
.....	刘银花 王守昱	(128)
忆田风同志	方 冰	(141)
忆田风同志	黎 军	(146)
在田风老师身边的几年	钟 吼	(152)
艺术的良师、生活的益友		
——追忆田风艺术教诲二三事	张 毅	(162)
良师益友		
——怀念田风同志	王同禹	(167)
怀念田风同志	官本毅	(174)
田风在我心中	汪 惟	(179)
忆田风团长	梅玉琢	(189)
田风同志为教师排戏	江 汗	(192)

怀念敬佩的老师——田风	康桂秋 刘 岩 王会安	(197)
使大连杂技走进艺术殿堂的奠基人——田风		
.....	王健民 秦惠珠	(204)
怀念我尊敬的导师——田风	秦惠珠	(211)
忆田风	李心斌	(216)
田风精神不死	邵默夏 张 琳	(224)
无私的奉献	张永庆	(229)
旅大人民召唤田风	吴 滨	(234)

五 北京电影学院时期

怀念田风教授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238)
痛悼我的恩师——田风	郭宝昌	(242)
教我学艺做人的恩师	司徒兆敦	(257)
雕琢人才的大师		
——忆田风老师	王心语	(262)
忆田风老师	黄蜀芹	(267)
导演从这里起步	段吉顺	(271)
严师和慈父		
——怀念敬爱的田风老师	卢 萍	(279)
艺海泛舟		
——回忆我的恩师	李 新	(283)
田风教授与导演艺术教学	王安达	(303)
音容笑貌今犹在		
——记恩师田风	吴天忍	(319)
心血流向学生心田		
——纪念田风教授	刘仲明	(325)
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白 唐	(330)
体味人生，圈点论定	琪琴高娃 李 伟	(334)
心血滴尽		

——忆田风老师	于杰	(337)
悼田风老师	赵家杰	(342)
深深的怀念	许雷	(345)
悼老田	汪岁寒	(347)
怀念恩师田风	李前宽 肖桂云	(355)

六 亲属的怀念

永恒的怀念	于华	(367)
怀念我们的父亲	田 兰 冬 冬 冬 梅	(393)
怀念我的弟弟——田风	田秀文	(401)
往事点滴	上官彦	(403)
忆舅舅	赵英明	(405)
做人的榜样	于从新	(411)

七 深切的哀悼

对田风同志的复查结论	(415)
田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大会悼词	(417)
田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通告	(420)
留取丹心照汗青	丛国滋 (421)
在骨灰安放仪式上为田风同志送花圈者名单	(427)

后记	编者	(449)
----	----	-------

我的自传

田 风

我原籍是河北省交河县泊头镇下店街，祖父是做点心的手艺人。父亲七八岁上祖父去世，家中就依靠父亲同伯父在书店印书为生，但也维持不了。父亲十四五岁时由乡亲介绍下关东在江省长顺镖局学艺，后入镖行保镖，后来当镖行吃不开时就改行入伍。父亲在保镖时就同东北的军阀如吴俊生、裴春生、万福麟这些人认识。所以入伍后一步步的就上去了，后来他一直当了陆军少将。他是个十足的旧军人，从小并没有念过一天书，学了一套武艺。他的性格粗暴，但为人朴实、诚恳，颇有行侠仗义之风。他在三十岁才结婚，母亲是个农家的女儿，结婚后就同父亲到关外。那时父亲当连长，驻防在辽宁省的北部兴城县，1912年我出生在兴城县，那时家里生活并不太好，不久家又搬到了洮南县。

洮南这个地方当时人烟很少，居民大多数是蒙古人，有些汉人也都是做买卖的商人。当我记事时，全城的居民也不过有百十多家，家里那时还不十分好过，当地的土地都是荒野，父亲在白城子七十户占了些荒地。父亲那时在廿九师吴俊生那里当营长，后来同他的关系弄不好，于是辞职去天津做事，这时我已经六岁了。

我们姊妹四个，姊姊比我大四岁，哥哥比我大三岁，我还有一个妹妹。母亲同我们就在洮南过活，母亲经营一切，雇了很多的长工，拴了两辆大车，在舅父的帮助下就种起地来。那

时每年有百十多石粮的收成，母亲把每年的积蓄都买了土地，她又很节俭，不过几年我们就成了有名的粮户，一直到今天我家里的土地究竟有多少我都弄不清楚。我只知道沈阳有一处住宅，有十几间房子，洮南城里有十几间房子和四五亩园子，再有就是在洮安县有三四百垧地，详细的数字我也说不清，那时我家里的生活是十足的庄家户的生活。

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很差的，父母都是没有念过书的人，只知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我们很小就都上了私塾，我从五岁一直念到十三岁，念了一部四书，八本共和国文还有一些杂字等。家庭里的教育只是受到母亲的一些影响。母亲是个不识字的人，非常的迷信。我记得我九岁、十岁上家里全家吃素，一直吃到十三四岁才开荤，母亲信“归一道”。每天是烧香念佛，我们也都成了善男信女了。因为父亲是个在清礼的，所以我七八岁时也在了清礼，每到公所有斋日时我是没有不去的。当我到初中时就吸起烟来，谁管它在礼不在礼呢？因为我们是河北省的人，在这里很少有亲戚，父亲不在也很少朋友，母亲对我们的教育不允许同人家接近，所以我的幼年就是在这样的地区、家庭里度过的。

父亲在天津干了几年的奉军驻津办事处的处长，从来就没回过家，家里只有母亲同我们一起生活。后来直奉战争奉军失败后，父亲也就下来了，把家搬到了沈阳，这时我才开始入高小一年级，没到毕业我就考入辽宁省立第二初级中学，一直读到毕业。

这时期的的家庭有了很大变化。在生活上，我们是由一个庄家户的生活变成了都市生活，家庭的经济状况，除掉每年可以收入的地租之外，父亲在天津还有一些存款，家里的生活是比较阔气的。父亲当时是不打算做事了，想纳福在家，后来他的朋友把他叫出，到沈阳被服厂做事，不久又到第四旅当副官长，遇到郭松龄反奉又到米春麟那里做事，米那时是奉军兵站总监，

他在那里当陆路股长。后来因为他同万福麟的关系，调他到第八军当兵站处处长，这个时期他一直是上升的，所以家庭的状况也自然上升了，哥哥在这期间也做了事，这时期我正在初中读书。

我没上小学时就很喜欢画画，后来我认了一位老师，姓关叫关子衡，是一个画国画的。他以画画为生，我同他一直学到我初中毕业。这个人的性格非常孤傲，生活很困难，他有一种文人隐士之风，置一切于度外，一生埋头于绘画。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一直到后来我在日本时，我同他的关系还是不断的。

我在初中读书时期，只能说是思想上萌芽的时期。当时的时代正当大革命时期，东北虽然在全国比起来是最落后的地区，但也不能例外，革命的浪潮早已波及到那里，学校的教员也有些进步分子，书店里也有些新鲜书籍。这时我开始读到一些文艺作品，我记得我最初读的是蒋光赤的《鸭绿江上》，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新文艺作品，后来读了很多。同时，东北这时期的国耻纪念很多，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各地屡次制造一些侵略暴行，如尖岛设领、万宝山惨案以至济南惨案等。这些对我的民族意识产生了很有力的启发。我初中二年级时，东三省才将五色旗换掉，那时我对中国的革命才刚刚知道。总之，初中这个阶段是我从封建愚昧的教育和环境下脱离出来，在思想上开始有一些国家民族的意识，对封建的制度、旧社会的传统抱着不满，新的进步的思想不断增长的启蒙阶段。

但是我和当时一般的学生不同，人家都是努力学习功课，可我唯一的想法同爱好只是画画。人家都是作什么升官发财的打算，我这种观念可以说是淡得很。我一向对东北那些军阀抱着恶感，我在思想上有一种消极的想法，只想画画。这种画画至上的想法在我的思想里不断起伏。

初中毕业后没有考取高中，补习了一年后，就到北平考入了志成高中。在我去北平之前二年，我的家已去黑龙江，父亲

已经不在粮秣厂做事，到望奎县任征收局长，我的家庭这时在经济等各方面已经达到顶点，以后就只是下降了，我在初中时就开始住校，到北平后完全是个人生活。我在志成高中的第二年发生了国家最大的灾难“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给我很大的刺激，使我的民族仇恨更加深了，在政治上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的专制误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当时在爱国的热情下不顾一切地行动起来，做各种宣传工作，后来加入了东北同乡会。当时我的目的是可以自由的进行爱国活动，当时我曾同他们到过一次绥远作长途的宣传，画了许多宣传画，做了些街头宣传。在这期间接触了一些人，受到一些影响，特别是在思想、学识上，他们大多是清华、北大、燕大各大学的学生，当时那个队里只有两个中学生，人家实在是比我们强得多，自己在当时觉得太不行了。他们曾给我介绍过一些文艺书籍，后来在我苦闷的时候，这些书就成了我唯一的同伴，它在我的思想上解决了许多的问题。我那时读过许多很好的书，如《一周间》、《毁灭》、《屠场》、《石炭王》、《煤油》、《母亲》、《夜店》、《士敏土》等，还有一些国内鲁迅的文艺作品同一些文艺理论的书籍。这一些书使我在阶级认识上、阶级观念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使我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发生很大的兴趣，从此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关心，对当时北平左翼的活动很敬仰。那时曾有同学同我谈过参加组织问题，我当时没有勇气，认识太差。我那时的想法是为人类解放是伟大的，牺牲是光荣的，但是我有什么能力可以解放人类，改造世界呢？以至我后来决心画画，都是因当时我以为这是我唯一的革命工具。我才下了决心。

高中快毕业的那一学期也是我思想上最苦闷的时期，自己对自身的前途想的最多，后来决心画画了。在高中未毕业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在美术学校埋头干了一个时期，那时的学校能学到什么呢？自以为画的很好，特别是在一次展览会后得

到了一些人的好评，对学校、对环境更为不满，自以为再学下去只是浪费时间。后来决心离开学校离开北平。那时自己对技巧上的要求是高于一切的，想去杭州美专，家里不同意。恰好这期间伪满限制东北的学生进关求学，对在北平上学的学生家庭，用种种方法为难，同时大批的学生就去日本上学，当时我知道我有个小学同学也去了东京，我就写了封信给他，我很想了解一下东京的情形，他的回信鼓起了我去日本的决心。他说日本很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学校的设备好。为了学到东西，我什么也都不顾忌了，我很快的回到家里，由于当时去日本念书所用的钱并不多，于是得到家里的允许，在 1934 年的 9 月 9 号我一个人就到了东京。

我初到日本东京时，为了补习日文入了东京神保町的东亚日语补习学校，这个学校是日华学会专为留学生补习日文设立的，有很久的历史，到日本学习的人大多入过这个学校，据说我在时人数是最多，有四五百人。这个学校并没有什么制度，交了学费就可以上课。为了准备考东京美术学校，同时我又入了川端画学校，这个学校是专为考美术学校或者是一些对美术爱好者的人自修设立的，学校的设备很简单，有一个先生每礼拜来看两次，也并不指导什么，学生是不少，最多时有二百多人。我在这里学了半年，1935 年的二月考东京国立美术学校未被录取，于是又在川端美校补习了一年，第二次考试（也就是 1936 年的春天）我和王式廓同志一同被录取了。

我先后在日本东京住了四年半，在这个期间，我接近许多的中国留学生，我虽是以伪满的名意留学，但是我很少接近东北的留学生。那时我是很进步的，所以我参加了许多的进步留学生组织和活动。我参加过中国留学生组织的“艺术座谈会”，“戏剧座谈会”，“美术座谈会”，“文化座谈会”。后来戏剧团体成立了“剧协”我也参加，中国留学生成立“学联”时我也参加。总之，在“七七”事变以前留日进步学生的一些文化活动，

我大部份都参加过。那时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进步的要求，同时为了可以学习一些东西，接触更多的人，所以我很自愿的参加各种活动。

东京中华青年会是留日学生集会的地点，我最初到东京时在那里吃饭，每天都去，所以认识了许多中国学生，我在这里参加几次的“艺术座谈会”，这个组织是些留日爱好艺术的同学们组成的。它团结了东京所有学艺术或者爱好艺术的进步同学。每一个月就开一次到两次的常会，讨论一些关于艺术上的问题，交换一些意见。同时可以聚餐一次，主持这个会的人当时有杜宣、魏孟克、林换平、张香山、陈松等，每次开会都有五六十人参加，后来这个组织成为东京所有文化团体的母体，我从这个团体认识的人最多、如：吴天、聂耳、丘东平、邢同华、杜宣、张水华、任白戈、黄新波、宫以民、林为梁、刘涤（雷加）、颜一烟、魏孟克、王式廓、张天虚、吴剑生、黄鼎等，这个组织曾发行过一个文艺刊物《东流》后来由魏孟克等又出了一个刊物《杂文》，以后改成《质文》。另外从这个团体产生了许多的团体，如“诗歌、戏剧座谈会”、“美术座谈会”、“文化座谈会”等，都是从这个团体分出来的。

曹禺的《雷雨》在东京上演时，我就参加过那次的演出，那时是郑振铎他们开始搞起来，后来因为他们是外行搞不通，于是洪叶、杜宣我们就都参加进去。演出后我们就成立了戏剧座谈会。他们是什么“话剧同好会”。我们成立后首次的公演就在东京筑地小剧场演出果戈理的《巡按》，同洪叶（吴天）写的一个独幕剧《堤》，我们的会员最多时有七十几名。如任白戈、邢同华、丘东平、高原、吴天、杜宣、林为梁、刘涤（雷加）、王式廓、张水华、张天虚、韦布、陈伯欧、聂耳、蒲风等。这个团体除了演出外，我们还组织技巧与理论上的研究，当时东京的戏剧团体就有三个，我们的立场是很明显的。“话剧同好会”是由一些阔少们组织起来的，“国际戏剧协会”是亲日分子搞的，

后来国内正当中共提出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进行东京戏剧运动的统一活动，将所有的团体统一起来成立“剧协”，共同演出《洪水》。后因内部不团结又各个分立。我们又成立了“中国留日剧人协会”，演出过易卜生的《娜拉》。我在这几个团体里都是负责演出，做演员，当时伪满大使馆曾屡次命令满洲学生不许同中国学生一起活动。但我是从没顾虑那些，每次演出我都参加。

我曾参加过“留东文化座谈会”，这是个读书会的组织，有各种讲座，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世界语、新文字，我曾读过哲学、同经济学两个讲座，读了有一年多，这个团体是由林为梁他们搞的，美协是由陈学书、宫以民、黄新波一些在东京画画的学生成立的，曾开过多次的座谈会，开过一次展览会。

“东京留日中国学生会”最初是由国民党的家伙们包办，对留学生的活动不但不给以援助，反而从各方面加以压制。郭沫若的两次讲演他们都是从中捣乱，以至对各个团体不承认为合法的组织，而从多方面破坏。于是留东进步的学生成立新学联，组织改选，使那个大会以至动武，一直闹到大使馆去向徐大使请愿。那时留东的学生活动可以说是盛及一时，东京在1935到1936这两年多的中间不断的演戏、开会，同时有一些刊物发行。如《流东新闻》、《杂文》、《东流》、《诗歌》等。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法西斯的发展，在“七七”之前留东学生的活动也就不断的被禁止、查封，留学生被逮捕，团体被解散，后来一步步的被压制下去。

“七七”事变爆发的当时我正准备回国，回来后想日本是不能再去了，到哪里去呢？那时只想到天津一次，如果能找到机会就可以走掉。后来被家里知道，就给监视起来，绝对的不许。平津的情况也弄不太清，当时使我实在是走投无路。

当时家里的情形是这样的，我哥哥在事变前死去，家里只有我父母同一个寡妇嫂子，她还在外面当护士。姊姊在事变前

二年同一个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学生结了婚，为了她的结婚我曾去过一次广州。我的妹妹结婚比较早，她同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结婚，家也是住在沈阳。家里的经济情况是日见下降，父亲是七十多岁的人，再也没人叫他去做事了，我知道家里的余款已经无几，生活所指望的只是洮南的地租，每年可有个千八百块钱的进款，再有沈阳的房子，每月可进几十块钱，北平有一家铺子（永兴洋纸行）有我们几千块钱的股份，这是1934年才加入的。我同铺子里的经理赵建臣很好，我在北平读书时，在经济上我们常有来往，来往平津，这个铺子就成我最好的关系了。

上海敌人开始登陆，战争是不可想象，一定要成为民族的战争，自己在当时有说不出的痛苦，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就想从日本走掉，没想到完全成了空想。当我这次去日的途中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对待外国人了，几次遇到特务的检查，因为我有学校的证明总算还没有什么，到了东京情形就越发的使人想象不出了。日本全国布满着战争空气，各港口出入的检查都非常的严，没想到又走了一条绝路。过去在一起的人们这时都不见了，中国留学生大部分回国，东京所遇到的只是些伪满的学生，当时是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每天画画，多看一些书，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待机。

后来有一个同乡，又是我在北平时的同学娄钊，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遇上了，谈起来，没想到他很进步，我们的痛苦都是一样的。后来从他那里又认识了几个东北的学生，为了解决我们的内心苦闷，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读书，我们就秘密的成立了一个读书会。我们大家开始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过去我虽是在“文化座谈会”读过一个时期的哲学同经济学，这次我们从起码的读起，我们在半年多的时间读了很多的书，在哲学方面我们从大众哲学读起，后来读日本永田广治所著的唯物辩证法同历史唯物论。经济学是从通俗经济学读起直至沈志远的

经济学大纲，用很长的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每逢礼拜天都是我们在公园、茶馆开会的时间，我们这个读书会，最多也不超过 10 个人，我们经常集会的有娄钊、于国勋、黄青涅、闫光，还有两个女同学。后来大家都读不下去了，战争一天比一天的紧张，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每天读书而不实际去做又有什么用呢？同时日本法西斯对日本的人民，不论在哪方面都一天天的加紧统治，对留学生的行动更加注意起来。过去虽然不能活动还可以自由看书，此时连看书的自由都没有了，并且经常的逮捕学生。东京 1938 年的冬天，是留学生最恐怖的时期。在这以前我曾发现了两本宝贝书籍。一本是毛主席所著的《论持久战》另外一本是《游击战术》，这两本书都是翻译成日文的，同时还读过一本《八路军从军记》是一位美国的女记者从延安到前线的日记，也是日文的。从这三本书里我发现了我的出路，知道八路军到了华北，是怎样的英勇抗战，同时更清楚的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主张和办法，使我非常兴奋。但怎样才能找到八路军呢？在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谈的这个问题，可是谁也没有路线。我想我在北京念了几年书，一定有认识的人的，何况我还接到过同学的一个亲戚王兰充满温馨的信，也可以从她那儿了解一些情况。于是我在大家的期望下，在 1939 年的春天回到了北平。

离开几年的北平已经被敌人给弄的不成样子了。过去的一些熟人遇到的没有几个，有的同学已经在北平的艺术院校当了教授。那时除了王兰，我所遇到的只有一个梁津，当时他还没有做事（他也是美专的同学，思想是很进步的），他也有意出城（参加八路军），他告诉我美专的同学周梦已到平西去了。这消息使我太兴奋了，虽然还不知道周梦在哪里，但我觉得已经有了指望似的。

我总认为一定能从这个关系出城参加队伍，后来我在北平住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在盼望周梦回来。但是始终没有消息，只

好托梁津将关系打通，到暑期我再回来就可以实现我的目的了。那时学校已经开学，我就又回东京了。

我在北平这一个多月心里非常着急，我急待着离开日本投到我理想中的祖国怀抱，参加那伟大的人类斗争，结果是没能实现。但我不能一直在北平住下去等着，只好把一切希望寄托到暑期。我到北京后的第二天就和王兰见面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断的在一起，她谈到她在“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时她是怎样的活跃，对环境的不满，对敌人种种的愤恨，同时她在文艺上有些修养，对我很热情诚恳，又因为几年前她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好的印象，所以我对她产生了爱的感情。她很爱我，她写信给我希望我回北平，这次她对我表示过更勇敢的态度，她曾对我这样说过：“你如果要同我结合，那只有我们一同出城（出城在北平就是参加八路军去）”。这次我们进一步的明确了我们的关系。可以说，我这次回来虽没直接达到目的，但有周梦的线索，又有了王兰心里感到充实些了。

三月的中旬我又回到了东京，东京又有很大的变化。敌人法西斯统治一天比一天的加紧强化，随之到来的在两三个月中间留学生不断的被捕，日本比较进步的学生也有许多入了狱。我们同年级的那个朝鲜同学奇雄已经被捕，还有几个日本的学生，当时东京伪满的学生是异常的恐怖，我们那时的行动更谈不到自由了，尤其是我刚从北平回去，对于国内的情形有了个了解。这次我回去只住了三个月不到，我每天都像是在牢里一样的度过，好不容易盼到了暑假，我是提前回来的。在家住了几天我就到了北平，同时在东京我还约了一个叫韩树铮的同学，他也是同我一样的想离开日本，这是 1939 年的 7 月。

当时华北正闹水灾，各处的交通几乎断绝，所以把我们就困在北平，周梦的关系也没接上。当时我们就只好等待。后来因为没有头绪我的那位同学就不能再住下去，他就又回日本了。我是无论如何也要等候着，即使周梦他不回来关系总有一天会

接得上。我当时每天在跑这件事情。当时我们东京的同学还有两个在北平，一个是娄钊，一个是于国勋的。他们也都是等着机会呢，后来他们同样是因为没有办法自己就想自己的出路。我当时因为北平有铺子，在经济上毫没有恐慌，我就一直等到暑期完了，突然一天一个美专的老同学王文趾找到我说：“过去美专的同学周梦从平西根据地回来了，他的任务就是扩大一批人到根据地去”，梁津也来告诉我周梦回来了。这消息简直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我太兴奋了，当天我就跑到周梦那里，从晚谈到天明。他向我介绍了平西根据地的情况，说：“你跟我走吧！”第二天我决定跟他到平西去，第三天，也就是 1939 年的 10 月 5 日我同周梦出了城，同来的还有王文址、凡坡、王兰、李有仁、周华等。10 月 5 号到了平西马栏村挺进军军区政治部，这就是我在八路军入伍的第一天，也是我得到自由的日子！